

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 中华文化认同构建*

张晓玲 曹芳凝

内容提要 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呈现出杂糅、多变的特点。新媒体成为他们构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他们通过新媒体建立与中华文化的超时空连接,表现出对中华文化较高程度的认同,视其为“根文化”,但仍然存在“情知失衡”“多重文化场域下的认同困境”等挑战。同时,新媒体通过“文化接触→兴趣激活”“内容筛选→认同内化”“社群互动→认同强化”“多元碰撞→认同调适”四个路径影响其中华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因此,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构建模式呈现出“四维驱动—双向调适”的动态发展特点。最后,“网络认知补足”“虚拟社群赋能”“线上心理支持”多层次认同实践路径可以帮助新生代华侨华人积极调适自身文化认同,在中德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 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认同 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 新媒体

中华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与文明传承的核心纽带,是推动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共识、协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驱动力,更是构成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的重要支撑。目前,德国有超过20万华侨华人^①,其中新生代华侨华人数约1.5万人^②。德国是我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中德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在这一进程中,德国华侨华人作为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双边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然而,在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的夹缝中成长的他们,文化认同呈现出复杂的特点。当前数字化的高度发展赋予了全球化新的机遇与挑战,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日益多样化,文化边界日益模糊化。^③在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媒体时代,信息生产、传播与呈现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④的文化认同愈发杂糅、多变,新媒体成为他们构建中华文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新时代国际组织胜任力培养与我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24VRC048)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新媒体时代德国青年侨胞的文化认同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JX092)的阶段性成果。第一作者张晓玲承担核心理念,形成定稿。第二作者曹芳凝承担数据收集,撰写初稿。

① 根据国内外相关最新数据,目前德国华侨华人口总数已经超过20万。参见 Statista: Anzahl der chinesischen Staatsbürger in Deutschland nach Bundesländern im Jahr 2024, Hamburg, 31 December, 2024,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74726/umfrage/auslaender-aus-china-und-korea-nach-bundeslaendern/>, 访问时间:2025年12月20日;刘悦《跨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欧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页;宋全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张秀明《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② 刘悦《跨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欧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③ 彭仁忠、吴卫平《跨文化能力视域下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接触路径研究》,载《外语界》2016年第1期。

④ 本文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青年”的定义,将研究对象“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界定为年龄在14—35岁之间的德国华侨华人。

认同的重要媒介。目前聚焦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鲜少,因此探讨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他们作为德国华人社区的新鲜血液,承载着中德人文交流的未来与希望,这一离散族群的中华文化认同亟需更多关注与深入研究。

一、文化认同的内涵嬗变

认同研究探索个体与自我、他人及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哲学、心理学到社会学的逐步深化和扩展。^① 本文聚焦的“文化认同”属于众多认同问题的核心之一,其概念受到不同学术领域与理论视角的影响,在国外学术界经历了从“历史的延续性”到“动态的演进性”、从“民族性与种族性”向“全球性与杂糅性”的演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从历史的延续出发,主张在全球扩张的语境中探讨文化认同,认为人们通常借助特定的符号、习俗和制度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②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总结了文化认同的三种立场:第一种将文化认同看作一种历史塑造的产物,根植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和集体的文化符号。^③ 第二种认为文化认同不仅反映历史,也反映不断变化的未来。第三种认为文化认同是在同与异的交流中形成的,处于动态的演进中。^④ 文化认同概念逐步向个体文化归属、动态过程导向转变。数字化时代,民族性和种族性与全球性和杂糅性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文化认同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民族界限,呈现出更为开放、包容、多样与杂糅等特性。这种现象在移民中尤为显著,主要体现为双重或多重文化认同。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催生了文化认同研究的新维度。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新媒体呈现出文化传承与解构的双重建构意义:一方面,数字媒介为青年提供的文化表达空间推动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危机与身份认同碎片化。^⑤

相较而言,文化认同在我国是一个较新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华人学者王赓武等考察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提出了“多重身份理论”,开启了国内文化认同研究的先河。^⑥ 从研究方法来看,一部分文献聚焦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呈现出理论框架的逐步深化:从全球化视角重构文化认同内涵,到聚焦华侨华人多重认同的必然性,再到揭示社交媒体语言对认同构建的媒介化作用,为相关实证研究奠定了多维理论基础。^⑦ 实证研究沿两条路径展开:其一,聚焦海外华人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播机制;^⑧其二,探讨双重/多重认同策略。^⑨ 此外,由于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新媒体

① 张禹东、陈景熙《华人社团与中华文化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6—189页。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p.125-130.

③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392-403.

④ Yang Bo, Zhao Dan and Liu Lu, “An Analysis of Hall’s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lipped Class,”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ICLCCS 2021)*, Paris: Atlantis Press, 2021, pp.177-184, here pp.178-179.

⑤ Maydiyan Pangesti,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Millennial Generation: Indonesian Case Study,” *Pubmedia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2, no.1, 2024, p.7; Ashok Kumar,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Media on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 Formation,” *Siddha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1, no.1, 2025, pp.1-16.

⑥ 王赓武、林金枝《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载《南洋资料译丛》,1986年第4期。

⑦ 参见郑晓云《文化认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8页;韩震《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研究》,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周庆生《语言与认同国内研究综述》,载《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1期。

⑧ 参见王爱平《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动机》,载《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李沁、王雨馨《华人华侨身份认同程度与中华文化传播行为研究》,载《当代传播》,2019年第2期。

⑨ 参见李其荣《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5期;李永《二战前美国土生华人“双重文化认同”成因探析》,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刘燕玲《当代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特征探析——以美国华人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

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表达媒介,海外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和表达方式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媒体对华人文化认同的影响成为研究新趋势。^①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文献居多,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特别是德国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则凤毛麟角。^②

文化认同的形态始终与场域特征及媒介技术深度耦合,也正因如此,其内涵也经历了从历史的延续性逐渐转向动态的演进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杂糅性的演变历程。媒介不仅是传播工具,更是塑造传播形态的关键因素。在口语和文字时代,地缘与血缘构成核心场域,口传叙事与文字纪史作为主要媒介,个体深受本地域长期积累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民族性与种族性在文化认同中占据主导地位,认同内涵相对单一且稳定,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本种族文化根源的追溯与坚守。在印刷和电子时代,印刷技术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重塑了场域空间,主流文化在电子媒介的传播下影响力增强,文化认同的构建受到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认同内涵在统一性与边界性之间寻求平衡。新媒体的普及使信息生产、传播与呈现系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秩序与场域,人们可以通过这类虚拟的“流动场域”轻松获取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信息,文化传播的互动性、即时性和个性化特征明显,个体不再被动接受文化,而是主动参与文化意义的创造和重塑,文化认同的内涵逐渐转向注重动态演进。同时,不同民族、种族的文化在网络空间频繁碰撞、融合,个体的文化认同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或种族,而是能够容纳多种文化元素,形成兼具根性与流动性的杂糅身份。因此,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深度互嵌的语境中,海外华侨华人依托新媒体平台,在数字化虚拟场域中通过对相关多元文化进行动态选择、重组与整合,实现持续性的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其核心特征体现为去中心化的主体性、场域交互的流动性以及数据驱动的文化杂糅性。

二、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现状

本文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三角校正法进行实证研究:在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期间对15名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后文中均使用化名);同时进行了问卷调查^③,共收集到188份问卷,其中159份为有效问卷,问卷信效度均好(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0,KMO值为0.81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差异 $p<0.05$),采用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代表“非常同意”;随后通过微信、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对受访者进行了线上追访和跟踪调研,对他们进行了非参与式动态观察,以补充和深入挖掘访谈和问卷内容。研究发现,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现状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将中华文化视为“根文化”;二是“情知失衡”现象明显;三是深陷“多重文化场域”困境。

(一) 血脉中的“根文化”

问卷调查显示,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的平均得分为4.02分,德国文化认同的平均得分为2.84分(见图1),可见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明显高于对德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访谈中,多位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血脉”“根基”等词汇表达自身中华文化认同,问卷题项“中华文化对我影响更为深远,是我的‘根文化’”得到了4.25的均分。相比德国文化(均分

^① 参见张少科《离散族群多元文化认同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3期;张焕萍《从“双重缺席”到“共同在场”——华人移民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黎相宜、朱荟岚《华人移民Up主的族群身份展演与反响——基于b站有关视频的话语分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参见刘悦《跨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欧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页。

^③ 本研究借鉴黄薇、毕重增(2021)的文化认同感问卷及质性访谈数据设置了中华文化认同题组及德国文化认同题组。参见黄薇、毕重增《简易一般文化认同感问卷的编制》,载《心理学进展》,2021年第2期。

1.99) ,更多的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认为 ,中华文化是他们的“根文化”。这一现象展示了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天然的、深层次的情感依附 ,折射出代际情感结构的深层同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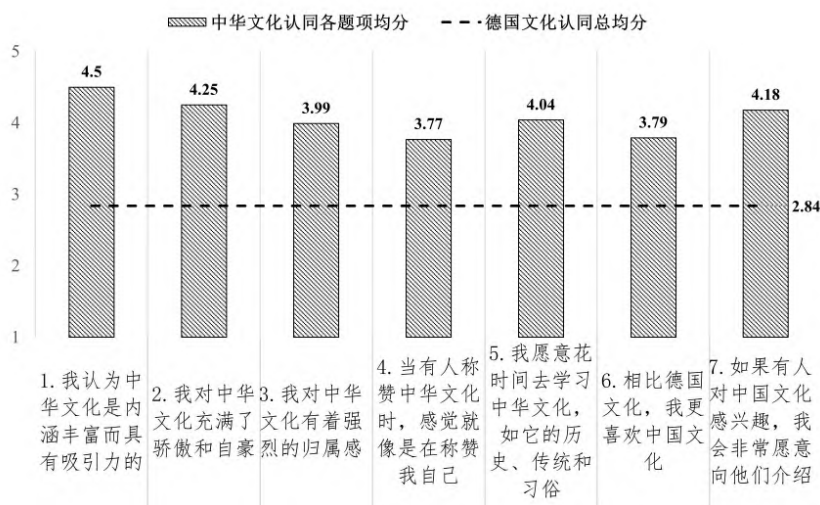


图1 中华文化认同问题组得分^①

同时,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例如,来自德国柏林的21岁华人郑女士提到,小时候她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化也不感兴趣。但从13岁开始,她开始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听中文歌,也喜欢上了学中文和中国文化,觉得拥有中国的文化背景是一件自豪的事。问卷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对中国文化更感兴趣”这一题项的平均得分为4.01。中华民族同根同源,与生俱来、基于血脉亲情的故土情结,是构筑文化认同的精神支柱。^② 身处异国的华侨华人往往通过对祖辈传承和历史记忆的回溯,构建起一个理想化的精神归属地。^③ 这种“远方的家”概念实际上成为情感与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依附,同时也在不断的跨文化碰撞中促使个体主动寻求和重构自身的文化根基。历史叙事、家族故事以及传统习俗等元素为这种情感联结提供了持续不断的支持,使得遥远的故乡在心理和情感层面上具备了不可替代的意义,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步增强和深化。

媒介历来是人们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④新媒体凭借强大的跨时空传播特性,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提供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和社交平台,为“根文化”提供情感补给,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二) 中华文化认同的“情知失衡”

认知作为情感的关键构成部分,对情感的产生、类别区分、体验及价值判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赋予情感评价性内容。^⑤ 中华文化认同的维系与加强,要求情感纽带与认知深度协同共振。然而,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虽然在情感上表达了对中华文化强烈的喜爱、接纳与认同需求,但在认知维度

① 资料来源:图作者自制。

② 赵秀忠、赵恒《中华文化认同与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 刘计峰、高楚东《马来西亚诗巫市华人的历史文化记忆与日常文化实践》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2期。

④ Leela Fernandes, “Nationalizing ‘the Global’: Media Images,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In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vol.22, no.5, 2000, pp.611-628.

⑤ 左稀《情感与认知——玛莎·纳斯鲍姆情感理论概述》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5期。

缺乏对中华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全面认识,存在情感与认知维度之间明显的不对称性。

尽管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在情感上更喜欢中国文化,具体体现在喜欢用中文交流、喜欢自己的中文名字、爱吃中餐、爱看中国的影视作品、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和服饰、历史文化和国风音乐等感兴趣。然而,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深感认知差距,强烈渴望接触中国文化的途径与可能。8岁移居德国的孙女士坦言,她对中国文化始终怀有一种“既亲近又遗憾”的复杂情感:既享受于探索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文化纵深,又因成长环境的割裂而自觉认知局限,如“像小学生”的中文水平、对传统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匮乏和对新时代中国的片面认识等。这种不对称性导致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构建的不稳定性。来自汉诺威的中德混血华人赵女士谈到,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长期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直至22岁首次在中国亲历春节,面对宗族祭祖、舞狮采青等鲜活文化实践时,突然陷入“局外人”的惶惑。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在纸面上建构文化想象,却因社会化过程中缺乏文化实践,在真实文化场景中暴露出“情知失衡”的中华文化认同困境。赵女士的自我质疑折射出“碎片化认同”,即在中德文化的间隙中,他们无法完全嵌入任一文化母体,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重构属于自己的“流动的根”。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犹如一把“双刃剑”,在降低文化认知门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情知失衡”。碎片化信息的爆炸性推送和算法推荐机制催生出浅层的文化接触与“信息茧房”,如若缺乏“去伪存真”的筛选能力,则极易引发认知混淆,动摇情感认同的稳定性;如若缺乏系统性的知识整合,则会形成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文化认知,即虽能强化与中华文化的情感联结,却难以深入理解文化内涵,导致文化认同悬浮于情感直觉层面。

(三) 多重文化场域下的认同困境

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主张文化认同首先是一个探究“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自我认知问题。随着年龄增长,多数新生代德国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增强,逐渐学会了悦纳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身份,充分说明了文化认同动态发展的特点。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德国文化的塑造和影响,经历着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所带来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迷茫,文化身份呈现出多重性的特点,面临一种“多重他者困境”^①。来自柏林的华人钱女士谈到,她曾长期面临身份认同的困惑——中国人不将她视为“完全的中国人”,德国人亦未接纳她为“真正的德国人”。这种双向的“他者化”曾让她反复追问:自己究竟属于何处?在自我叩问中,她一度认为自己是“无处归属的异乡人”,处于“非此非彼”的中间地带。德国教育与社会塑造的西方思维模式与家庭中传承的中式思想观念持续角力,导致“该听谁指挥”的决策焦虑。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甚至使得她经历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产生怨恨和抗拒的阶段,认为“当一个纯粹的德国人似乎更容易一些”。这种状态在文化场域转换时尤为凸显,^②当个体从日常生活的德国文化场域切换至中国文化场域时,往往更容易陷入“承认缺失”,造成认同危机。^③

新媒体时代,一方面他们通过网络平台建构“云端中国身份”,比如在社交软件学习网络流行语、参与线上虚拟社区;另一方面这种虚拟世界的文化实践时常与现实脱节,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在“虚拟与现实”中进行身份转换时文化认同的焦虑和迷茫。^④可以说,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在祖籍国文化、移居国社会和网络虚拟空间的三重场域中,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矛盾性和杂糅性的特点。

① 周海霞《德国影视中的华人影像及在德华人演员身份认同探析》,载《德语人文研究》2021年第9期。

② Jürgen Bolten,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eine ganzheitliche Perspektive“, *Polylog*, H.36, 2016, S.23-38.

③ 焦龙保、龙宝新《从自我认同到他者承认: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化解》,载《当代教育科学》2020年第11期。

④ 周静《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危机及其治理》,载《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三、新媒体对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路径

新媒体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等渠道,以及电脑、平板、手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①作为“数字原住民”,^②新生代华侨华人在信息获取方式上展现出鲜明的数字化特点。本文的量化调查对象中,94.34%使用中文互联网新媒体。在这些新媒体中,使用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微信(99.33%)、小红书(86.00%)、哔哩哔哩(68.67%)(见图2)。因此,探究新媒体对其中华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路径,有助于揭示新生代华侨华人如何借助这一平台积极面对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的迷茫与挑战,从而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实现文化认同的动态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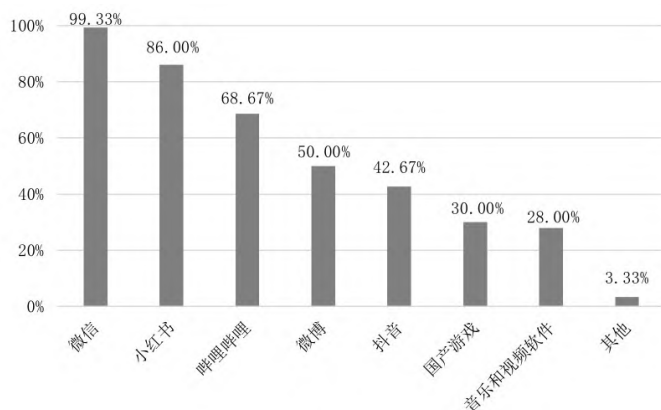


图2 中文互联网新媒体使用情况^③

总体来看,大部分的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认为新媒体影响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并且对于了解和探究自己的文化认同有正面影响。其中,相比对于德国文化认同的影响,更多的被调查者认为新媒体加强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其作用和效果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拓宽了解中国的渠道、及时跟进中国的动态、改善对中国的印象、了解积极的中国形象、结识中国朋友、提高中文水平、熟悉中文的网络用语和流行用语、学习更多中国历史和国情知识、了解中国的流行文化、通过中国网络新闻平台和社交媒体关注中国时政新闻、了解更多中国美食、了解中国节日习俗、更加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进行一段时间的交换学习、间隔年(gap year)或实习等。

具体而言,新媒体具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功能,使文化认同建构成为一个连续而动态的过程。首先,数字平台使受众能够快速获得大量信息;其次,受众通过筛选功能过滤出符合自身兴趣和价值观的内容,并对信息进行理解;同时,经过认知和情感加工,这些信息逐渐内化为个人文化身份的一部分;此外,受众通过分享和自我呈现,将内化后的文化元素固化为一种稳定的认同形式;最后,在全球互联网多元文化的互动中,不断通过反馈和交流对这种认同进行动态调适和再确认。

(一) 影响阶段一:文化接触→兴趣激活

如前文所述,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怀有源自血脉深处的深厚好感。然而,他们也面临“情知失衡”的困境。一方面,缺少能够助力他们开展系统学习的平台与渠道;另一方面,中文学校的教学内容往往过于刻板,只是机械地照本宣科,难以满足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深入且多

① 董洁、王硕、小幡佳菜绘等《语言与新媒体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趋势》,载《语言战略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曹培杰、余胜泉《数字原住民的提出、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载《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

③ 资料来源:图为作者自制。

元的认知需求。而中国互联网新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虚拟接触点”,通过即时性、高覆盖性与文化贴近性,推动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完成“文化接触→兴趣激活”的初始阶段。具体而言,平台以短视频、图文推送等形式突破地理与时空限制,使海量中华文化信息快速触达用户,形成文化认知的“线上入口”,带领他们迈入中国文化的大门。高频次、碎片化的信息流不仅降低了文化理解门槛,更通过沉浸式内容将抽象符号转化为具象体验,触发认知敏感度。这一过程以“兴趣驱动”为核心机制,初步建立文化印象,激发探索欲,为后续文化内化与文化认同奠定基础。调查问卷题项“使用中国社交软件和网络平台拓宽了我了解中国的渠道”得到4.25的平均分。

(二) 影响阶段二: 内容筛选→认同内化

认知内化是个体获取外界信息后在心理层面转化为自身态度和行为的过程。^①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与外界相互作用的认知系统,通过同化和顺应来推动认知发展。^② 而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主要通过中国新媒体接触中华文化信息后,基于个体兴趣与认同需求对内容进行主动筛选与加工,推动中华文化认同从表层认知向深层内化过渡。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环境中,用户通过关注双语创作者、订阅历史科普频道、加入爱好者社群等行为,精准定位符合自身文化探索需求的内容,形成“选择性吸收”机制,通过认知加工与情感共鸣,将信息整合内化为个人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同化与顺应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他们接触到与自身已有认知相符的中华文化信息时,比如一些传统节日的基本习俗,这部分信息会被同化到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进一步强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而当遇到与原有认知冲突的信息,如某些地域独特的文化习俗,他们的认知结构会发生顺应,对原有认知进行调整和扩展,以更好地接纳新信息。15岁移民德国的陈先生提到,他特别关注哔哩哔哩上讲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视频,认为这些视频让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思考与理解。研究数据显示,使用中国网络平台的频率与中华文化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皮尔逊相关性系数 $r=0.371$, $p<0.01$)。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表明,中华文化认同水平可被使用频率正向预测(中华文化认同 = $3.293+0.244\times$ 使用频率),印证了中国互联网新媒体对认同内化的驱动作用。

(三) 影响阶段三: 社群互动→认同强化

在身份建构层面,以往以群体身份为主的自我呈现方式正逐渐被个人身份的自我呈现所取代。^③ 新媒体不仅包括信息的输入,用户也随时随地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信息输出与自我呈现,主动展现自身文化身份符号,同时借助社群互动(点赞、评论、转发)获得情感支持与认同确认。^④ 同时,文化认同与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及其所处的社交圈密切相关。^⑤ 华侨华人社群和社团活动是加强华侨华人间联系、在社群中建构和调适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拥有相似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的新生代华侨华人一般能够彼此理解、找到共鸣,从而在文化认同层面相互沟通和交流。例如,来自德国南部的21岁华人朱女士表示,自己和华侨华人朋友交往更轻松,更能彼此理解,有更深的情感联结。但同时,不同于北美洲和亚太地区国家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德国华人没有

① 苏欣、曾灿博《需要、情感与认知:心理学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考》,载《广西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Samandar Zokhidov und Azizbek Karimov,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Cognition: Assimilation,”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Journal*, vol.3, no.3, 2024, pp.60 - 67.

③ 吕宇翔、纪开元《流动的身份展演——重访社交媒体演进史》,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陈静茜《表演的狂欢:网络社会的个体自我呈现与交往行为——以微博客使用者之日常生活实践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年。

⑤ Heinz Abels and Alexandra König, *Sozialisation: Soziologische Antworten auf die Frage, wie wir werden, was wir sind, wie gesellschaftliche Ordnung möglich ist und wie Theori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Identität ineinander spielen*, Berlin: Springer-Verlag, 2010, S.9-13.

形成像“唐人街”那样的华人聚居区,而是较为分散地居住在各州。每位受访者都提到,渴望能够拥有更多认识华侨华人朋友的渠道。在调查问卷中,分别有41.51%和24.53%的参与者对“建立一个属于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线上社交空间(如线上论坛、账号等)来进行交流、倾诉和交友,会对在德新生代华侨华人在文化认同上遇到的困难和迷茫有较大帮助”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通过中国新媒体的社交互动功能,得以在群体反馈中实现中华文化认同的固化。本研究观察发现,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不仅积极尝试使用中文发布动态,有时更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深刻感受和体会。“与其说我哪里都不属于,我更希望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家,而且多元化真的超级酷,因为80%德国人+80%中国人=160%>100%。以前的我不懂得怎么去接受自己的双重身份,现在的我真心感谢父母出了国让我从小在两个文化中长大大,也从很多人嘴里听到他们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形成了现在的我。”(来自受访者相关社媒文案)这样的自我呈现在评论区引发了年轻华人社群的共鸣与讨论,让他们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通过线上社交网络,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能够结识更多有相似背景的同龄人,并共同分享他们的跨文化经历,形成跨越时空的认同共振网络。这些线上互动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文化认同过程中找到同伴支持,减轻身份认同迷茫带来的焦虑与压力。这一机制通过“分享—反馈—强化”循环,推动文化认同的稳定性建构,更通过内容扩散形成涟漪效应,推动中华文化在跨国社群中的传播与创新再生产。

(四) 影响阶段四: 多元碰撞→认同调适

新媒体是一个开放的场域,^①这为新生代华侨华人提供了独特的跨文化实践场域,推动其在对比、选择与杂糅中调适自身文化认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文化边界变得模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频繁。^②通过同时接触西方互联网新媒体(如WhatsApp、Twitter、Facebook、Instagram、TikTok等)与中国网络平台,用户主动对比中德及其他文化符号,并在批判性反思中进一步筛选和整合文化元素。这种动态调适催生了“百宝箱”式杂糅认同,即拒绝非此即彼的身份二分法,转而追求在多元文化中积极汲取多种文化元素,动态调适和重构自身文化认同,实现“冲突中平衡、动态中扎根”的杂糅流动文化认同。这种杂糅的文化认同不是负担,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一种独特的优势。在面对多元文化更加自如的同时,他们也拥有了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在理性的基础上建构并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的能力。14岁移民德国的楚先生明确表示,文化认同首先是充分认识并接纳文化差异,然后才是找到归属感,从而形成自身文化认同。

四、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模式

文化认同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处于动态调适过程中的,它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持续的互动和对话不断被重塑,并愈发呈现出杂糅性和多元化的特征。^③在数字化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文化认同的建构已超越了地理和民族的界限,展现出鲜明的杂糅性和跨文化性。这一转变标志着从结构化、同质化的“第一现代”范式向流动化、杂糅化的“第二现代”范式的过渡,文化认同因此呈现出更为多元、包容和开放的特征。^④同时,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当今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

① 张楠《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挑战与机遇》载《新闻论坛》2022年第1期。

② Jürgen Bolten: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neu denken?!* Wien, 2016, https://rcc.hslu.ch/fileadmin/user_upload/downloads/Interkulturelle_Kompetenz/Interkulturelle_Kompetenz_neu_denken_Universitaet_Jena_2016.pdf. 访问时间: 2025年12月25日。

③ Yang Bo, Zhao Dan and Liu Lu, “An Analysis of Hall’s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lipped Class,”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Studies (ICLCCS 2021)*, Paris: Atlantis Press, 2021, pp.178-179.

④ Jürgen Bolten,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Thüringen: Druckerei Sümmerda GmbH, 2007, S.14-19.

文化认同的建构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超连通性(Digital hyperconnectivity)”成为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① 本研究结果显示,德国新生代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对中华文化展现出了更为强烈的认同感,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与中国文化持续接触和交流的机会。首先,新媒体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打破时空限制:一方面,互联网跨越了地理空间的障碍,使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能够轻松地在网络世界获取中华文化资源,并与中国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动态保持紧密联系,拉近了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距离。另一方面,互联网克服了时间滞后性,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和国际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从而在时间上与中华文化的动态发展保持同步。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连接,使得他们在德国也能维持并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互联网符合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数字化生活方式。作为“数字原住民”,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已深度融入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日常生活,^②他们熟练掌握各种数字工具和平台,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和在线论坛等渠道与全球华侨华人社区保持联系,并参与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当中。总之,互联网如同一个熔炉,融化了原本固定和僵化的文化边界,以其强大的时空跨越能力,打破了物理界限的限制,实现了中德文化的时空连接,从而弥合了中德文化差异,缩短了中德文化距离,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与中国文化时刻保持联结的机会。在其影响下,中德乃至多元文化元素形成跨文化协同作用,即通过相互交流、融合、促进,突破原有文化边界,产生积极的再创造效应。^③

为了从符合当代特征的新视角分析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本文构建了“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模式”(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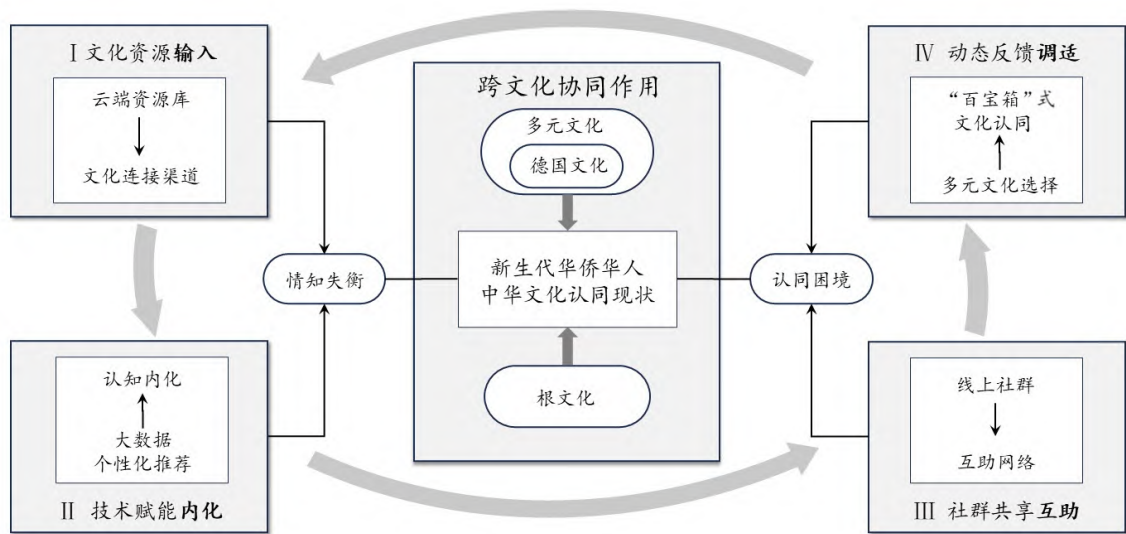


图3 新媒体时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模式^④

本研究揭示,当代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程度较高,是一种深植血脉中的“根文

① Rogers Brubaker, “Digital Hyperconnectivity and the Self,” *Theory and Society*, vol.49, 2020, pp.771–801, here pp.775–778.

② 惠良虹、王勃然《大学生数字原住民特征对在线英语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载《外语界》2022年第1期。

③ Jürgen Bolten,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kulturelle Wirtschaftskommunika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5.

④ 资料来源:图作者自制。

化”,但他们仍面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情知失衡”和多重文化场域下的身份认同困境。在此背景下,其中华文化认同建构模式呈现为以新媒体为核心枢纽,“四维驱动—双向调适”的动态建构模式。通过文化资源输入、技术赋能内化、社群共享互助与动态反馈调适四个驱动维度的交互作用,推动文化认同转向跨文化协同作用下的杂糅文化认同:

一是文化资源输入。通过微信、小红书、哔哩哔哩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构建中华文化云端资源库,整合中华文化经典与当代创新内容,以碎片化、趣味化形式降低认知门槛,突破物理时空限制,实现更便捷、灵活、与时俱进的文化接触途径,帮助年轻一代在繁忙的生活中依然能够有机会对中文和中国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的学习。

二是技术赋能内化。借助大数据智能算法推荐,帮助新生代华侨华人筛选、加工文化信息,实现认知内化。前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帮助新生代华侨华人缓解中华文化认同“情知失衡困境”。

三是社群共享互助。依托新媒体的互动功能,鼓励新生代进行主动产出,如发起文化认同话题讨论、分享跨文化场域中的生活片段等。同时创设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的线上互助网络,形成新生代华侨华人互联网线上社群,加强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沟通与交流,找到与同胞的情感纽带,从而积极调适自身文化认同。

四是动态反馈调适。以开放的心态推动新生代华侨华人充分借助全球新媒体平台赋能,在批判性反思中筛选多元文化元素,形成“百宝箱”式杂糅认同,既保持文化根基又适应多元社会需求。后两个维度对新生代华侨华人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身份认同困境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本模型中,以新媒体为枢纽,文化认同建构四维驱动形成“输入→内化→互动→调适→再生”的动态循环。所谓“再生”指文化认同调适后的文化表达和文化认同自我呈现,可以反哺数字化平台资源库,重新成为文化输入的“源头活水”。

总之,该模式通过文化输入弥补认知缺口、数字技术赋能推动认知内化、社群互动破解身份困境、动态反馈调适多元认同的闭环机制,最终实现帮助新生代华侨华人在中德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形成既深植于中华文化根基,又能有效融入德国社会的跨文化杂糅文化认同,从而得以更好地在中德文化之间扮演桥梁角色,即在中德文化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实现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强化,同时更好地在德国这个多元文化场域中传播传统和现代的中国文化,在中德跨文化交流与互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结 语

随着媒介形态的发展,文化认同的内涵经历了从民族本位到全球杂糅的演化过程。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文化认同的构建机制,使其呈现出去中心化、流动性与多元性的新特征。在此背景下,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展现出以“根文化”为特点的高情感认同。然而,他们仍面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情知失衡”和多重文化场域下的身份认同困境。新媒体通过“文化接触→兴趣激活”“内容筛选→认同内化”“社群互动→认同强化”“多元碰撞→认同调适”四重路径,影响了德国新生代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

在新媒体时代,海外新生代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建构,展现为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四维驱动—双向调适”的动态过程。凭借新媒体平台突破时空限制的互动特性,他们能够对中华文化展开动态的“根性”溯源,并于多重文化场域的交互碰撞中,持续重构自身的认同边界。通过碎片化信息接触、算法精准筛选、社群内部互动及多元文化调适,推动文化认同从静态“历史延续”模式向动态“协商演进”模式演进,彰显出海外华侨华人文化认同从被动地缘依附向主动数字

参与的转变。

据此,本文提出三层次实践路径:第一,网络认知补足:创建系统性中华文化资源库,通过线上课程与文化交流项目整合碎片化文化内容为结构化知识体系,依托新媒体平台提供灵活学习路径,弥合情知鸿沟;第二,虚拟社群赋能:组建新生代华侨华人线上社群,促进经验共享,缓解文化认同焦虑;第三,线上心理支持:搭建线上互助“树洞”应用程序,以心理咨询及互助小组形式消解多重场域压力。

以数字技术中介为核心的动态协商式文化认同机制具有普遍意义,不仅为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拓展了分析框架与研究边界,也为新媒体时代海外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现代化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侨务工作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路径参考,以增强新生代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向心力,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和认知根基。

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new-generation Chinese diaspora in Germany is characterized by hybridity and fluidity. New media has become a crucial medium through which this group constructs their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By establishing a trans-temporal and trans-spatial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via new media platforms, they demonstrate a relatively high degre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regarding it as their “root culture”. However, they st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ffective-cognitive imbalance” and identity dilemma under multi-cultural contexts. New media influenc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four primary pathways: “cultural exposure to interest activation”, “content filtering to identity internalization”, “community interaction to identity reinforcement”, and “multicultural encounter to identity negotiation”.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model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the new-generation diaspora in the new media era reveals a dynamic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a “four-dimensional drive and bidirectional adjustment”. Furthermore,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ree levels of practical pathways—“network cognitive compensation”, “virtu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online psychological support”—that can assist the new-generation Chinese diaspora in actively negotiating and adjust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thereby enabling them to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Sino-Germ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ultural Identity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New-Generation Chinese Diaspora in Germany New Media

(张晓玲,教授;曹芳凝,博士研究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邓颖洁)